

# The Dual Dimension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The Practice Value of “Tracing the Origin” and “Pursuing Perfection” in Huizhou Garden

Shudong Cao

Anshun University, Anshun, Guizhou, 561000, China

## Abstract

As a monumental public space embodying historical depth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Huizhou Garden stands as a three-dimensional cultural artifact. The historical knowledge, architectural paradigms, ritual norms, and design templates it preserves undoubtedly serve as definitive “standard answers” — distinguishing it from ordinary parks by integrating exhibition hall functions while fulfilling cultural heritage missions. Yet upon closer examination, notable shortcomings emerge: Huizhou Garden exhibits numerous errors and omissions in textual documentation and craftsmanship details. The transmission of civilization transcends mere textual records; its essence is embedded in every tangible creation — this is both the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al sites, and the tangible manifestation of artisanal spirit. While these imperfections in Huizhou Garden are not critical flaws, they warrant scrutiny in terms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During my cursory visit, I identified several instances for critical examination, not to nitpick or seek flaws — after all, Huizhou Garden’s grand vision remains intact, and its imperfections do not overshadow its merits.

## Keywords

Craftsmanship spirit; Culture; Form; craftsmanship spirit

## 工匠精神的双重维度：以徽园为例论“追本溯源”与“精益求精”的实践价值

曹曙东

安顺学院, 中国·贵州安顺 561000

## 摘要

作为兼具历史积淀与文化属性之大型公共空间, 徽园本身即一立体之文化产品。其所承载之文史知识、建筑范式、礼仪规范、图式样本, 当为确然之“标准答案”: 盖其异于寻常公园, 更兼展览馆之功能, 肩负文化传承之使命。然细读深察, 不免有憾: 徽园于文案撰述、工艺制作之细节处, 多有讹误疏漏之弊。夫文明之传递, 非仅文字之载录; 文明之灵魂, 实依附于每一实体造物之上——此乃文物与历史遗迹之所以珍贵, 亦为工匠精神之具体彰显。今徽园之疏失, 非为大瑕, 然于文化传承之责而言, 不可不察。笔者仓促一游, 偶拾数例, 兹考订辨证, 非欲吹毛求疵、洗垢求瘢——毕竟徽园之宏旨未失, 瑕不掩瑜。

## 关键词

工匠精神; 文化; 形制; 工匠精神

## 1 缘起

徽园者, 皖省文化之名片也。其营构初衷, 乃以安徽舆图为基架, 列诸州府之园、馆, 铺陈各地历史沿革、人文特质、贤达轶事、风土民俗及物产菁华。此园非徒为景物之聚合, 实乃安徽文化之浓缩——于异乡人, 是窥皖地文明之便捷津梁; 于同乡者, 是慰藉乡愁之精神枕席。

徽园坐落于合肥经开区, 始建于一九九九年。千禧之

初我赴合肥求学, 数载光阴匆匆, 竟未得暇一访; 二〇一三年离皖赴西南谋生, 此后每次归乡, 虽皆于合肥暂驻, 乡音乡情聊慰客愁, 却仍与这处皖地文化地标擦肩而过。二〇二四年春节, 携稚子畅游合肥, 既览新老安徽博物院之文脉积淀, 亦赏淮河路步行街之市井烟火, 逍遥津的上元彩灯更添佳节意趣。途中稚子屡屡发问, 关乎皖山皖水之沿革、江淮文脉之兴衰, 我虽勉力应答, 却常感所知有限, 言语难尽其间底蕴——正是这份对故土文化的敬畏与言说之困, 让我在归程前夕, 决意踏访徽园, 亲近这兼具文化深度、情感温度与传播力度的安徽名片 [1]。

【作者简介】曹曙东 (1976—), 男, 中国安徽芜湖人, 讲师, 从事油画和综合材料创作研究。

## 2 遭遇徽园

### 2.1 醉翁亭前研联语，字斟句酌求真意；滁州园中思传承，心追手摹续文脉。

滁园入目，醉翁亭先映眼帘，此亦情理中事。携稚子驻足，先述亭之由来与《醉翁亭记》作意，再趋前细品亭柱楹联——历来观览史迹之楹联诗章，我皆嘱小儿随行笔记，待归后再作深究，此番亦然。楹联之为物，实乃传统文化之活载体：对仗之工、典故之蕴、繁字之形、书风之韵，皆可化为启蒙之资，让孩童于游观中渐染文气，此中乐事，践行者自知。

然观联之际，一小小尴尬不期而至。其联云：“翁昔醉饮时，想溪山入画，禽鸟亲人，一官谴责何妨，把酒临风，只范希文素心可证；我来凭眺处，怅琴操无声，梅魂不返，十亩蒿莱重闢，打碑剔藓，幸苏长公墨迹长存。”惯例先令小儿自识自断，生僻字词和典故则共询度娘，旁征博引，相得甚欢。唯“一官谴责何妨”句，细读之下终觉窒碍，于史于文，皆有未洽。

考诸史事：范文正长欧阳文忠十八载，二人志同道合，同为庆历新政之骨干；苏子瞻则为文忠门生，三代贤达同朝，皆抱“以天下为己任”之襟怀，共推文学革新之业。联中并及三人，复加撰联者“我”之凭吊，时空交错，物象相生，颇有“对影成三人”之浪漫意境，其构思本属上乘。然“谴责”二字，实乃关键之误[2]。

昔文忠公因庆历新政牵连，贬谪滁州，时虽仕途受挫，却为政宽简，深得滁民爱戴，史有明载。“谴责”一词，含贬斥非难之意，与文忠当时之境遇及时评全然相悖；若易为“迁谪”，则恰合其生平——文忠为官四十载，近半月月辗转贬途，此二字既道尽仕途坎坷，更显其不以个人得失为念、唯念天下苍生之开阔胸襟。且“迁谪”之下，与后句“把酒临风，只范希文素心可证”遥相呼应：《醉翁亭记》成于庆历六年，而范文正《岳阳楼记》亦作于同年后期，“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之句，与文忠公“与民同乐”之怀，同出一源，皆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家国情怀，千古绝唱，精神相通。

下联“我来凭眺处，怅琴操无声，梅魂不返”，亦含深致。琴操为北宋名妓，才艺卓绝，乃苏子瞻红颜知己，后遁入空门。“琴操无声”一语双关，既叹子瞻世俗之无奈，亦悲其政治理想之沉湮。“梅魂”则指代“欧梅”——此梅原为文忠公手植，苍颜多癖却枝繁叶茂，幽香不绝。其品种稀有，不抢腊梅之先，不与春梅争艳，独伴杏花而开，故曰“杏梅”，恰如文忠公高洁品格：虽处政治险恶之境，不为沽名钓誉，独守本心，与知音共勉。“十亩蒿莱重闢”，则暗合文忠公之政治选择：仕途失意而不消沉，寄情山水却不忘民生，不能治国平天下，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正是《醉翁亭记》“与民同乐”之核心主旨。“打碑剔藓”之细节，

状写后人探寻史迹之虔诚：“幸苏长公墨迹长存”，既指子瞻手书《醉翁亭记》碑刻历经沧桑而不朽，更寄寓文化精神虽经磨难却生生不息之欣慰。

吾非刻意为文字苛责，实因中国文字之博大精深，正在于一字千金、意蕴万千。文化精品之精神价值，往往藏于精微之处，一字之差，轻则语境乖违，重则意蕴全失，此联便是明证。诸多玄妙，虽累牍连篇亦难尽述，而一字之误，竟令千古风致稍减，殊为可惜[3]。

该联为清代学者薛时雨（1818-1885）所撰，薛先生乃安徽全椒人，道光年间乡试第一，咸丰年间进士，官至杭州知府，后因看不惯官场腐败，辞官讲学，主讲多所书院，门生遍布天下。其为晚清著名词家、十大联家之一，更是文忠公之“铁杆粉丝”，亦是醉翁亭之重建者。以薛先生之学识与对文忠公之敬仰，断无可能用“谴责”二字；此误之延续，不仅令观者对薛先生之学识与观点产生误判，更是对先贤之不尊重。

此“谴责”之误，相传为书法家吴伯初先生书联时误听所致。吴伯初先生（1927—1996），全椒乡人也，承家学之渊源，工书画，笃教化，其行谊在乡邦有口皆碑。然笔墨之事，偶有疏失，本属人情之常，未可深责。所可异者，此误竟历四十载而未正，任其悬于亭柱，展于人前——实无异于对先生之“公开处刑”，非独掩其所长，更失对逝者之尊。先生虽为地方名人，其墨迹之文物价值与艺术境界，若衡之以珍品之格，似尚有间。滁州文脉绵长，善书者代不乏人：如范振海先生，兰亭奖得主也，其汉简书法，立意高远，笔墨深沉蕴藉，气息醇厚古雅，卓然成一家之风。若能请先生重书此联，更正旧误，既复薛时雨先生撰联之本义，又添琅琊山水之文韵，使古今贤达之精神相得益彰，岂非美事一桩？

醉翁亭承载之，不仅是山水之乐，更是唐宋贤达之家国情怀与文化精神。愿此小误早日更正，使观者于赏联之际，既能领略文字之妙，亦能感受文化传承之严谨与温度，如此，方不负醉翁之意，不负先贤之望。

### 2.2 法式恪守，乃形制之基；天门“謹”断，为地理之实——二者皆需循理合度，方不悖人文与自然之真。

滁州园迤迤前行，便至马鞍山园。巨幅照壁之上，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手书“千古风流”四字，笔力苍劲，墨气沉厚，恰是对“诗城”马鞍山人文底蕴之凝练、自然风光之写照，堪称点睛。园林介绍，镌于一方石质书券之上，开合之间暗合“诗城”文脉，其文曰：“马鞍山园总面积五千平方米，由主体建筑太白楼、照壁、牌楼及临水假山等构成……”（见图一）九十余字，简括其要，然细读之下，两处纰漏赫然在目，标点符号与数目字之使用，未合规范。

标点之用，自有其矩。除破折号、省略号等特例，逗号、句号之属，皆当单占一格，此非小节，实乃为求文字间距匀

净,避标点挤压汉字而致版式淆乱。观文中“由主体建筑太白楼、照壁、牌楼及临水假山等构成”一句,两处顿号各占半格,而前文“平方米”后之分号、左页诸标点,又皆单占一格。一随意之举,令原本竖成列、横成行之排版失序:左页齐整,右页参差,视觉之美荡然无存。形制之规,本在整齐中见庄严,如此错乱,未免辜负石书设计之巧思。

再观“五仟平方米”之“五仟”,用字尤乖其理。“仟”为“千”之大写,“五”之大写则为“伍”,此乃汉字数字书写之定例。在财务、契约、公告等正式场合,大写数字之使用,非为繁复,实乃防篡改、避纠纷之必需,是人文社会中“信”之载体。寻常书写可作“五千”,郑重其事则当为“伍仟”,“五仟”之谓,半文半白,半俗半雅,既失规范,亦显轻率,于“诗城”之厚重文脉,殊为不称[4]。

采石矶之介绍有云:“原名牛渚矶,位于马鞍山市区西南部长江东岸,李白的名作《望天门山》就是在此创作的……”此说殊不严谨,不免有攀附名人、强牵文脉之嫌。考诸典籍,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明载:“天门山在县西南三十里,有二山夹大江,东曰博望,西曰梁山,相对如门,俗谓之天门”,①直指天门山为东西梁山对峙之形,地处当涂县西南,与《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之地理实景,一一契合。明代周珏《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亦注:“两小山夹江,即东梁(今芜湖市郊西北)、西梁(今和县东南角),一名天门山”,②从文学评注之维度,印证了天门山之具体所指。

今之芜湖天门山景区,与采石矶相距近三十公里,其地貌为“两小山夹江”,而采石矶则是“三面临水、孤峰耸峙”③,地理位置与形貌特征,判然有别。强将《望天门山》归之于采石矶,不仅误导游客,混淆地理之真,更易引发兄弟城市之嫌隙,实非明智。殊不知李白本有《牛渚矶》一诗,直写采石矶之景:“绝壁临巨川,连峰势相向”,其雄奇壮阔,不输《望天门山》,只因流传不广而鲜为人知。若能于此介绍中彰显此诗,既合地理之实,又推介诗仙佳作,岂不更显“诗城”兼容并蓄之文脉气度?

马鞍山园院墙内壁的碑刻,似一部镌刻在墙体上的诗史。名家手迹与文人题咏纷至沓来,既沉淀着“诗城”千载文脉的悠长,亦彰显着江南地域人文荟萃的厚重底色。碑刻之为物,本是书法筋骨与诗文神韵的双重结晶——笔锋的流转与辞章的意蕴互为表里,方能臻于形神兼备、美美与共之境,这是中国文人艺术“文墨共生”的传统要义。伫立碑前细品,此前翘首跂踵的热切期许,竟在目光摩挲刻石之际渐次平息。盖因眼前林散之先生的碑刻,徒具其形而失其神妙,笔墨间的灵韵已为粗疏的镌刻所斫伤,几近枯槁之态。须知林散之乃马鞍山书法史上的巅峰人物,更是明清以降草书艺术的集大成者与开宗立派的宗师。先生以画法入书,破千年笔法之桎梏,干湿浓淡极尽变化,独居“秋林含烟”之美学意向。古人论书有云“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

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恰是先生书法的传神写照——其精妙全在毫厘之际的拿捏,形差一线则韵失千里,此乃中国书法“尽精微而致广大”的美学极致。而今园中之碑刻,刀法粗疏,细节全无,原作的笔墨意趣与精神气度已大打折扣。这般对经典的草率复刻,严重辜负了大师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化的传承脉络中,碑刻本是连接古今的精神载体,既要传递笔墨的形质,更要延续艺术的神韵;若仅求其表而失其里,便沦为文化符号的空壳,这或许正是当下地域文化传承中亟需警惕的症结所在[5]。

### 2.3 振风塔下存文脉,当循古制传真韵;碑记文中昭史迹,宜守旧规续正声。

未抵安庆园,振风塔已凌霄欲起,遥眺可见。挈稚子趋前,共读碑刻简介,冀窥其沿革与营造之制。不意此番研学,披览文本、探其原委之时,远不逮为小儿辨正讹误、析其症结之辰。:“振风塔,又名万佛塔,坐落安庆市区迎江寺内。始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高648米为八角七级楼阁式,集我国历代佛塔建筑艺术之大成。塔内168级,线路多变,游人多迷。塔临江岸,与名刹迎江市相依相隈,华严壮美,是古老安庆的象征,享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美誉。此塔按原塔二分之一仿建而成。安庆市人民政府二〇〇〇年十二月”。(见图二)简介凡百五十八言,其间违规失范、用字乖谬、体例错乱、计量驳杂等皆违碑刻文本之规制与古建筑表述之通则:

(1)方位表述匡正:“坐落安庆市区迎江寺内”之弊有二:其一,语法乖谬,《马氏文通》明“记所在之处,介以‘于’字者常也……”;④其二,地域泛化,地标建筑当标至具体辖区,应补“迎江区”,正为“坐落于安庆市迎江区迎江寺内”,方合语法之序、文气之顺,使方位归属确凿无疑。

(2)纪年形制规范:“始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该句括号内公元纪年缺“年”字,则古今衔接断裂,故补“年”字为“(1568年)”,合碑刻古今对照之通例,兼存考据价值。

(3)断句应合文理:“高648米为八角七级楼阁式”该句标点阙如,“648米”后当加逗号,断句以明语义层次。

(4)宾语明确指涉:“塔内168级”该句宾语缺失致语义浮泛,故补“台阶”二字,明指涉对象,正为“塔内168级台阶”。同理,“按原塔二分之一仿建”该句中量词后缺失明确宾语,可解歧义众多:高度、宽度、资金量。正为:“按原塔二分之一比例仿建”。

(5)用字义理溯源:“与名刹迎江市相依相隈”之“隈”,《说文解字》“水曲也”,与“亲近”义无涉;而“隈”字,《玉篇》释“亲近也”,罗隐《柳》诗“相隈相倚不胜春”。故正“隈”为“隈”,既合《说文》义理,又承诗性文脉,使表述恰切典雅。

(6)落款形制规范:“二〇〇〇年十二月”该句有两重疏漏:1、句中数目字为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混搭。《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⑤指明“阿拉伯数字‘0’有‘零’和‘〇’两种汉字书写形式。一个数字用作计量时，其中‘0’的汉字书写形式为‘零’；用作编号时，‘0’的汉字书写形式为‘〇’。”2、纪年形制不明。该纪年未明公历纪年或干支纪年，语义不详。《出版物上数字用法》明确“非公历纪年，示例……”⑥。原文杂糅失范，不合规制。如是公历纪年，应正为“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兼合竖排文字气韵，保纪年形制之正 [6]。

### 3 结语

徽园既是国家AAAA级景区、合肥文旅地标，更是承载江淮文脉的安徽名片。远古文明与现代气象交融，自然胜景与人文景观共生，方寸之间尽现江淮大地之全貌，处处浸润微风皖韵。实为皖地文化精神之具象化呈现。

然其文字考据，未能臻于“追本溯源”之境；工艺考究，亦未达“精益求精”之度。徽园之为文化产品，肩负着钩沉江淮历史、挖掘皖地文脉、普及乡邦名人风物之使命，其所呈现者，当为无可置喙的史事之真，与赏心悦目之形制之美。工匠精神之落实，正在于细节处之一丝不苟，与品质上之极致追求—— 文化传承，非仅器物之静态保存，更是精神之动态接续；文字较真，非迂腐之墨守，实乃对文脉敬畏之心的具象化；工艺考究，非苛责之吹毛求疵，而是千锤百炼之匠心传承。一字之正，关乎史事之真伪、文韵之清雅、先贤之尊崇，更系乎后代启蒙之正途；一物之精，关乎品性之端方、风致之蕴藉、品物之盛景，亦牵连后学工匠精神之接续。今日之中国，身为全球唯一全供应链工业大国，傲立于世，工匠精神之弘扬与落实，早已超越器物层面，成为彰显大国文化软实力与工业硬实力的双重象征。惜乎当日未能亲览展馆全貌，加之上述诸般不尽人意之处，游兴遂减，意兴阑珊而归。归途之中，感怀良多：身为漂泊游子，乡愁在此未能寻得妥帖疏解之境；身为认祖归宗之人，稚子亦未能对故乡之深厚底蕴，获致深刻而全面之认知；而作为寻常游客，外人又何尝不会因些许疏漏，对安徽文化产生误读与偏见？然心之所向，仍存期许：愿徽园能于来日精进不辍，在细节处打磨、在品质上深耕，真正成为承载皖地文脉、彰

显大国匠心的文化地标，向世人展现一个更厚重、更纯粹、更具精神魅力的安徽！



图1 马鞍山园介绍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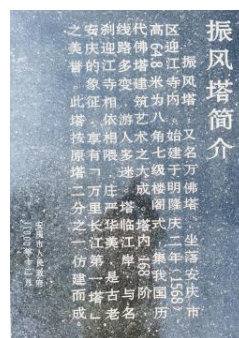


图2 振风塔简介图

### 参考文献

- [1] 乐史.太平寰宇记(全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一二八·江南东道十(当涂县条目)
- [2] 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M].穀采斋刻本.1635.卷三十·七言绝句类
- [3] 太平府志纂修委员会.太平府志[M].合肥:黄山书社.2010:卷五·輿地志·山川
- [4] 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56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出版物上数字用法[R].北京:2011:5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出版物上数字用法[R].北京:2011:2